

中国政治发展与权力政治学： 对话北京大学李景鹏教授

樊小川 蒋馨尔 孙宁浩*

编者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有志于从事政治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发起组建了“政治学评介”这一公益性、学术性公众号，旨在传播有品质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分享有价值的学术信息，组织有意义的研究活动，为繁荣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公众号自运营以来，已经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杨雪冬教授的倡导和推动下，公众号开辟了“学术春秋(学人专访)”专栏，将以访谈的方式，邀请前辈学人分享他们的学术人生，以多角度展现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和政治学的学术魅力。2022年，来自“政治学评介”的樊小川、蒋馨尔和孙宁浩三位同学(以下简称“政治学评介”)曾有幸深入访谈学界前辈北京大学李景鹏教授。李先生的研究扎根于中国政治发展历程，内容涵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等多个方面，并开辟了以动态视角解读政治现象的“权力政治学”新领域，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分析框架上有所创新。有鉴于此，本刊特刊此文，以纪念李景鹏教授对学界的贡献

学人简介：李景鹏，1932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曾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

* 樊小川，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政治学评介”团队负责人之一；蒋馨尔，华东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政治学评介”团队成员；孙宁浩，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政治学评介”团队成员。



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政治学会副会长。李景鹏先生最初在大连海运学院进行航海驾驶专业本科学习，1953年由于国家在高校组建政治理论课的要求被调离本科学校，并进行为期一年的政治经济学研习，随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修班，1956年正式毕业。毕业后李景鹏回到大连海运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1957年调入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先后从事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与研究，1980年后重点从事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直至2000年退休。李景鹏先生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与反腐败等，先后赴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参与会议和发表学术演讲。主要著作有《政治管理学概论》（1991）、《权力政治学》（首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修订后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2000）、《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2002）、《挑战、回应与变革：当代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思考》（2012）等，先后在《天津社会科学》《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2020年7月30日，李景鹏受邀参加由北京大学俞可平主编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会议期间表达了对于研读《政治通鉴》全集的深切期待，并同时表示“政治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也仍如此。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排除各种干扰，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造福我们的国家，造福我们的人民”。

政治学评介：

李老，您好！“政治学评介”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对话。我们了解到，您早年

曾在大连海运学院学习，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修班，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您能否与我们简单谈谈 20 世纪 80 年代前您的求学和研究经历？

李景鹏老师（以下简称李老）：

感谢“政治学评介”的访谈。我对此问题简单谈一谈。

其实，我少年时曾幻想航海，所以后来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那时在学习期间除修读专业课程外，学校也提供政治方面的书籍让我们学习，主要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一些政治文件。我无意中找到两本书：一本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另一本是《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我对逻辑特别敏感，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深深地被其中严密的逻辑性吸引，便认真地将其读完，从而萌发了对于社会科学兴趣。与此同时，国家正计划着在全国高校建立政治理论课，而师资就在各个学校的专业学生中抽调。在我临近毕业实习的时候，那年（1953）暑假过后刚刚返校，学校便通知我调到政治教研室。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服从组织调动就是义不容辞的事。后来我想，当时之所以把我调出来可能是因为我是班里的小干部，可能也知道我对社会科学感兴趣。

到政治教研室之后，我被分配负责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时能读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只有苏联出版翻译过来的十七本小册子，它完全是按照《资本论》内容的顺序编写的。因此，它也就很好地体现了《资本论》严密的逻辑性，使我大感兴趣。我很快就读完了这些小册子，进一步就开始读《资本论》。虽然有些经济理论我还不太懂，但是它的严密逻辑使我很有兴趣地读下去。

一年以后（1954 年秋），政治理论课有向多专业发展的需求，于是学校就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修班去学习中共党史，因此我又开始钻研《毛泽东选集》。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大连海运学院教了一年“中共党史”的课。第二年（1957）我被调到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到北大以后马上就赶上了“干部下放劳动”运动，北大各系的教师全部下放到门头沟区斋堂地区，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到 1959 年上半年才撤回学校。从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3 年上半年，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内我都比较稳定地进行教学活动。到 1963 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便又开始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1966 年上半年才回到学校。到 1970 年，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便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班，我和几个同事又带着学员搞开门办学，带着学员到工厂、农村、煤矿、海港，边参加劳动边上课，直至 1976 年招收了最后一届工农

兵学员。后面就恢复高考了。

回顾这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环境动荡不定，工作本身也没有什么社会效果，但是在此期间，由于我还比较善于学习，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为后来的研究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二

政治学评介：

李老，您于1957年调入北京大学，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见证了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重建与发展壮大。请您讲述一下您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工作经历，又是怎样的契机让您的研究重心转到了政治学与中国政治？

李老：

我是1957年调入北大的，先后在政治系、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从我开始在北大工作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和做研究，但是没有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而且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在那段时间里没能很好地充实自己的文史基础，这是我感到很遗憾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后，我对自己的研究和工作的都是比较满意的。1982年，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重设政治学专业，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在1991年，我近六十岁的时候带了第一届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生。我和其他同仁一起为政治学重建耕耘，我们有学术成果，有受社会认可的研究机构，也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教材出版，这都是非常可喜的成就。二十多年前新学院成立后，更是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并把他们输送到了国家社会的各个岗位中。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重建在全国带了好头，之后我们国家就产生了一阵政治学复兴的热潮，一直到今天形成了这样百花齐放的局面。

到了北大之后，我将较多的精力投入政治学系的重建、恢复工作。早年我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研究，后来关注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和中国政治的研究，更关注中国政治学的复建和发展逻辑，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重点从事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级招收的是国际共产主义专业的学生，我开始给他们讲授科学社会主义专题课，而其内容几乎已经是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后来“政治学原理”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的。与此同时，由赵宝煦先生牵头，我们一起准备在国际政治系下面建立政治学专业，当时我作为国际政治系的副主任，系里决定由我负责建立政治学专业的工作。1982年政治学专业正式建立，198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和本科生。也是由赵先生牵头，我们开始编写《政治学概论》，紧接着又成立了政治学教研室，并逐步开设了“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等课程。我给本科生讲“政治学原理”，给硕士研究生讲“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权力政治学”的雏形）。到1988年，政治学专业彻底从国际政治系分出，正式成立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三

政治学评介：

李老，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政治学领域从教的二十年间您重点关注的议题有哪些？为什么您会如此关注这些问题呢？

李老：

在进行政治学教学同时，我也密切地关注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并参加了一些有关改革的活动。因此，对于利益、腐败等问题的研究有所涉猎。

我最早关注的是利益问题。在过去下放劳动和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亲眼看到劳动者劳动热情的低落，很多人都是出勤不出力，甚至形成“懒惰的竞赛”。原因就是人们的利益得不到实现，结果使得社会失去了动力和活力，这使我感觉到利益问题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人们追求利益的合理性，提出“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追求利益”的观点。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大河没水小河干”，我在文章中则强调“小河没水大河干”。后来我又进一步探讨了关于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此外，我早年也探讨过政治腐败的问题，指出政治腐败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的观点，后来的一篇文章从十五个方面分析社会变迁与政治腐败的关系。政府体制改革也是我比较关注的议题，我曾多次参加人事部召开的关于机构改革的研讨会。我提出行政组织结构的四个层次，即组织结构、功能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在该议题下，我探讨过中国官本位传统对政府机构的影响；行政单位小团体利益的影响；行政组织的自律和他律的问题；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

型政府、回应性政府的建设问题；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问题；等等。针对政府决策，我提出政府面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应该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同时可以做出可行性报告和不可行性报告。在充分研究两个报告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不可行性报告提出的问题，这时做出的决策才是比较科学的决策。

我还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机遇的形成、政治形式与政治文明、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竞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曲折性等问题。我的这些探讨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而且当时的一些新观点现在已成为常识了，但是它们展现了我研究的心路历程，我也尽到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四

政治学评介：

在《权力政治学》一书中，您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探究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对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刻解析。您为什么在政治学研究中尤为关注“权力”这一要素？权力分析的视角对于解读中国政治有什么帮助？

李老：

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中，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渐渐恢复，人们在了解国外政治学研究状况的同时，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便已感觉到政治学原来的静态理论分析框架无法解释事物的实际运行机制，因此无法依靠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去分析大量的实际问题。于是，探索一种新的、动态的理论分析框架，非常必要。

我这一探索的理论出发点便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世界本质的思想。对于这一思想，恩格斯是这样阐述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的。而在现实中，任何一种现象所呈现出的状态实际上都是事物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定格局。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对我的影响是极深的，它构成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因而也就成为我构想这种新的分析方法的理论出发点。恩格斯接着又说：“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因此，我尝试研究的动态分析方法就可以看作是在这个总的框架之内，具体研究各种现象相互作用的一种尝试。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再深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事物的相互作用的状况是很复杂的，其作用的形式更是千变万化。但是任何事物的相互作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用的不平衡性。任何两个力量的相互作用都不可能是平衡的。虽然在作用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平衡状态，但那只能是暂时的现象。随着过程的发展，暂时的平衡必然要过渡到不平衡的状态，而不平衡的状态才是事物相互作用的经常性状态。既然事物相互作用的基本状态是不平衡的，那么其中必有一方的力量更大些、更强些，因而处于主导地位；而另一方由于力量小些和弱些，则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这样，在两个相互作用的事物之间便产生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实际上贯穿于一切事物的相互作用之中，显示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显示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定格局来。这样一种认识就可以转化为一种分析方法，那就是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状况看作事物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定格局。进而，分析在这种格局中哪一方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哪一方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分析这种格局形成的环境、条件和原因；分析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具体行为方式；分析当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对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这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是和原来的静态分析方法完全不同的动态分析方法。

但是在构筑这一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即如何概括这种分析方法呢？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学概念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概括事物的相互作用现象和从中引出的分析方法。于是我便从国外政治学的概念中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权力”。“权力”这一概念在国外政治学中被定义为一种“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它就可以涵盖一切相互作用的现象以及这种

作用的不平衡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不平衡的相互作用的现象叫作权力现象，由这种现象所引起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由这种关系所造成的格局就是权力格局。而这种动态分析方法就可以称为权力分析方法。把这种分析方法引进政治学的领域，就是政治权力分析方法。

当然，权力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仅有一般性的叙述是不够的，必须使之规范化。这就是要对政治权力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并要对这种分析方法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系统的阐述，并由此尝试构筑一个权力分析的体系，我的《权力政治学》就是这一探索的成果。

五

政治学评介：

您对于我国民主发展的历程也颇有研究，曾经发表过《政治平等与党内民主》（2002）、《建立民主恳谈和民主决策的新机制》（2003）、《民主的逻辑与民主的建设》（2011）等论文。您认为民主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李老：

对民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一个热门的问题，我也写过一些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的研究和探讨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过去对民主问题的研究多倾向于对民主一般规律的研究，而缺乏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因而多少有些盲目性。历史上，民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实现都是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土壤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只有极个别的国家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其民主是从外部引进或强加的。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的民主问题也应该从如何为民主的发展创造适合的社会和政治的土壤做起。有了适合民主发展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土壤，民主才能在中国逐渐地生长起来。而我们过去的研究却缺乏这一块的分析。现在，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全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建立起来的接地气的民主理论，解决了我辈多年探讨的中国民主发展的问题，令我辈汗颜！今后将学习和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我们研究民主问题的方向是必要且恰当的。

六

政治学评介：

您对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体现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已然发生深刻变革。您对于利益结构有什么独到见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在哪些方面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李老：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活在利益问题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们的利益观念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原来被封冻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从而使个人利益从社会的整体利益中游离出来，形成社会利益的基本单元，而且很快便进入利益的饥渴状态，展开了全社会规模的追求利益的热潮；（2）在利益追求热潮的基础上，社会的利益竞争便在社会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中全面地展开，这一方面为社会带来发展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现象；（3）人们对感性满足的追求空前强烈，从而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4）人们的社会关系商品化，围绕着利益追求人们交往的范围空前地扩大，而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变成实现利益的工具；（5）金钱在社会中的地位空前地提高，社会中几乎一切事物都有了标价，而钱权交易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6）小团体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各个单位都有了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特殊利益；（7）经济犯罪现象普遍地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8）地方保护主义出现；（9）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10）社会利益集团产生并进一步发展；等等。而这一切现象对政治发展既提供了动力又形成了挑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使我认识到，这一切变化都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结果。

实践已然证明，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社会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近十几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社会利益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造成

许多使人们难以理解的现象,给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带来许多难题。

那么什么是社会利益结构?一般而言,所谓社会利益结构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这种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这方面来说,它的形成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它形成的具体过程来说,又是离不开人们的意志与行为的作用的,是各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控制和调节的结果。在各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或支配利益资源的状态。那些能够掌握和支配对生产过程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资源(例如生产资料)的人们,自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占有主动和优势的地位,相反的人们则只能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社会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和调节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而国家的控制和调节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占有主动和优势地位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影响,从而使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实现。因此,利益结构形成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们之间各种不同的利益矛盾,也伴随着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不同矛盾。因此,任何一种利益结构都既是社会利益矛盾的结果,又包含着新的利益矛盾,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运作中的动态平衡。从利益结构概念的分析中就可以引申出利益结构的基本要素。

利益结构的第一个要素是利益单元。因为谈到利益问题,首先就要问是谁的利益,这就涉及利益主体的问题,也就是追求和享有一定利益的人或人群。而作为利益主体的人或人群,总是以不同规模的组织形式出现的,这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单元,如个人和家庭、工作单位、利益集团、阶级、民族和国家等。这些利益单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彼此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利益结构。因此,考察利益单元在一个社会中的相互结合方式及其特点是研究利益结构的重要方面。

利益结构的第二个要素是人们的利益观念。这是利益单元的一定结合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任何一种利益观念的形成都要经历长期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然而当它一旦形成之后,便对社会利益结构起着极大的维护和巩固作用,以至于即使社会条件变化了,利益结构变化了,它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存在着并产生影响,成为新的利益结构发展的障碍。作为利益结构在心理层次上的要素,它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内在动力。

利益结构的第三个要素是人们利益追求的性质。不同的利益结构导致人们利

益追求性质的差别：有的趋向于平均，有的趋向于差异；有的体现为共同向社会索取，有的体现为彼此的竞争；有的呈现有序状态，有的呈现无序状态；等等。在同一种利益结构中，人们利益追求的性质也不相同：有的追求温饱，有的追求享乐；有的以追求物质的东西为主，有的以追求精神的东西为主；等等。总之，利益追求的性质问题，是对不同利益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和对同一利益结构内部分化状况研究的重要因素。

利益结构的第四个要素是人们追求利益的一定方式。针对不同的利益结构，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有的利益结构中，人们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力量直接地去追求各种利益；在另外的利益结构中，人们则依靠集体或国家的力量间接地去追求各种利益。在同一种利益结构中，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去追求利益；有的人依靠占有生产手段或一般社会财富去实现利益的追求；有的人依靠其他的手段去实现利益的追求；等等。

利益结构的第五个要素是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利益分化的状况往往通过一定社会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反映出来。正是由于各利益阶层以不同的相互关系结合在一起，才显示出一定的结构来。所以，它是形成社会利益结构的最直观的因素。分析社会利益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可以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利益的分化，这样，社会利益结构便与社会阶级结构相适应，这对于分析社会利益结构的历史变迁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的利益分化，从这个角度所形成的社会利益分层情况与阶级结构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但这种分析从某种研究的角度来说仍有其价值：它对于分析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动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微观或中观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此外，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

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可见利益结构地位之重要。从这里也产生了利益结构的特征。利益结构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转化功能，可以将人们外部的各种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转化为人们的内在要求，然后再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它是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内在要求。这一特点使利益结构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与灵活性，它既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领域的“公约数”，又能随时与三大体系联系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

利益结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我对于利益结构的研究和理解基本就是这些内容。

七

政治学评介：

您于2014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强调，作为治理体系核心的政府应改掉成年累积的弊病以迎接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您如何理解我国的现代化问题？

李老：

现代化问题和民主问题一样，必须联系中国的国情来研究才有意义。2014年的这篇文章也属于泛泛之谈，缺乏实际价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不满足于“四个现代化”，希望还有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而当时所希望的政治现代化指的是民主问题。如前所述，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至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政治现代化，这是一个比民主更复杂的问题。其涉及的面应该是非常广的，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扎扎实实地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党中央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当务之急。至于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现代化，这将是一个今后需要长期进行探索的问题。

八

政治学评介：

您从事政治学研究已四十年有余，也教导出了非常多活跃在我国政治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您认为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还存在哪些空白领域或不充分之处，需要去继续跟进？

李老：

我曾经的学生中有许多现在都成为名教授了，而我已经脱离学术界多年，现在到了我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了。不过有时我也在思考一些问题。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大意是：事情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依靠高度集中和高效率的行政权力，克服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推进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另一方面，它也掩盖着原有的行政痼疾，例如官本位的旧传统、政治腐败、小团体利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等。另外，在一片高歌猛进充满正能量的大好形势下，也隐藏着社会道德低下的问题。过去特殊时期造成的社会道德真空、道德荒漠状态，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这些被当前形势掩盖着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能变成主要矛盾。所以，我认为需要有人跟踪研究这些问题，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

九

政治学评介：

再次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参与学人专访。最后，您有什么寄语可以送给立志从事政治学研究的青年学生？您对学术公益组织“政治学评介”有什么要求和期待吗？

李老：

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可以继续在游戏学领域深耕，要坐得住“冷板凳”，杜绝浮躁功利，踏踏实实做学术，多花点时间读文献，尤其是自己研究领域内的前沿学术著作。政治学是一个广博的学科，除本学科体系外，还要多多关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容，融会贯通，扩宽自己的知识面和眼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当然，我们做政治学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扎根中国政治社会现实，要在实际问题中发掘出有价值的研究议题，之后再琢磨怎么去形成理论。最后也要让研究回归现实，我们研究的成果最好是要能给国家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帮助的。

“政治学评介”是一个有希望的组织，你们有很多朝气蓬勃、对政治学研究抱有热情的年轻人。看到有那么多年轻人对政治学感兴趣，我很欣慰。期待以后你们能产出和传递更多有价值、有思想的内容，继续惠及有志于政治学研究的学子和学者们。